

往事如昨

1978,
我那憋屈又解气的高考

尹浩洋 撰文/供图

我是1978级的大学生。和很多年龄比我大的同学一样，我参加过两次高考，第一次是信心百倍，第二次是憋屈又解气。

第一次参加高考时，我信心百倍，因为我的学习底子不仅在同龄人中是最好的——中学四年10个班级500多名同学中，我的总成绩一直第一，也因为我早知道快要恢复以文化考试为主的高考了。

我那时是昆嵛山深处一名下乡插队的知青，怎么会消息这样灵通？无他，我给著名的教育家、物理学家周培源写了一封信，而他老人家还回信了。就是在回信中，周老告诉我“可靠消息”：“高考今年可以恢复了，只要认真复习，就有可能结束你没有学习环境而苦恼的问题了。”

我为什么给周老写信？因为他在当时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很有影响的论基础学科教育的文章，我当时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就写信让报社转交给他了。

我其实并没有认真复习。这不是我自负，实在是当时插队的牟平县莒格庄公社官家沟大队就没有我可以看的书籍和资料，但这一点不妨碍我在牟平六中的乡村学校考场尽情发挥，而且考完落实了答案后，我倍增自信。

1977年高考，是成绩没出来前就要填报志愿的。因为高中最后一年受到了化学老师姜秀芳的好多鼓励，并担任了化学课代表，我在四个填报志愿的空格里，填写的都是化学类专业，最后一个志愿也是山东大学化学系。没想到，体检结果出来，我是红绿色盲！

这对我打击极大。要知道，我辅导过的一个知青小兄弟都考上了北京钢铁工业学院。

那年年底，大队推荐我招工回城时，我询问家人：可以不回烟台当工人么？当时，我被推荐到牟平县知青办写材料，管吃管住一个月补助30元，拿出9元回大队买工分，而我们那个大队效益很好，一个劳动日算1.08元！年底“煞账”，我这个整劳力算下来一个月可以收入59元多。我说：“我听说当工人一个月才26元钱，而且当了工人，可能就不让参加高考了吧？”城里人都嘲笑我：“没读上大学倒是迂腐了！适龄工人一样可以参加高考。”

于是，我回到了烟台，在烟台橡胶厂做了一名炼胶工，每天和成堆的炭黑、原胶尤其是炼胶机打交道。工作有多苦？每天都要补助2角钱的“吸尘费”。

我开始抛弃理化，一心恶补史地。我要转科，参加文科考试，不上大学誓不罢休！

那些“三班倒”的日子里，我的老班长养成了习惯——找我我要到处喊我名字，因为我完成炼胶任务并化验合格后，就不见了。开始时老班长以为我不遵守纪律、不坚守岗位，后来发现我就躲藏在他眼皮底下的岗位上——在所有同班工友的配合下，我上面一把大扫



作者读大学时留影

帚、下面一把大扫帚，全身披挂肮脏的工作服，藏在更衣室角落里呼呼大睡。因为我把业余时间，全都用来复习史地知识了。

虽说适龄工人可以参加高考，但工厂是不支持我们参加高考的，因为我们这几个热心参加高考的年轻人都是厂里的工作或文体骨干，我是团总支宣传委员。厂长和车间主任嘲笑说，天天这样学习有什么用？你们这帮学生，上学全是到处乱跑，不学文化，哪里有本事能考上大学？

在这样的环境下复习，我们这些年轻人能不憋屈吗？直到参加高考的头一天，我还要上夜班。年轻人的精力旺盛，现在想想自己都佩服自己：我精神抖擞地参加了我的第二次高考。在进入烟台十中的高考考场前，看到别人都在极为认真地翻阅资料背诵题目，我也翻开手头的政治复习资料，正好看到“阶级”的名词解释。我不熟悉，就背诵背诵它吧！哪想到进入考场，拿到政治试卷，第一眼就看到“名词解释”题中赫然有两个大字：阶级。我觉得，那5分是老天爷鼓励我的锲而不舍的！

然而，考场上的自我感觉良好，很快就被盼望不到录取通知书的郁闷压抑住了。直到一天下班后，我已经进入第一道浴池冲洗了——说明一下，我那个炼胶岗位是全厂最脏的工序，连下班洗澡都要首先到专用的一个小房间淋浴，冲洗掉全身的炭黑粉尘之后，才能进入大家公用的普通浴池去洗澡。我还没进入公用浴池呢，炼胶车间的技术员满脸笑容，急匆匆地进来喊：“尹浩洋！烟台市（老芝罘区）教育局来电话让你去拿大学录取通知书！恭喜了，我们橡胶厂第一个大学生！”

大喜过望的我立即带着浑身浓郁的胶皮味道，骑自行车飞奔了7个公交车站的距离，取回了盼望已久的录取通知书，然后自豪地去厂部办理了所有相关手续。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再没有去烟台橡胶厂上班。我离开了那个让我憋屈、又让我最终听到了最解气消息的地方。

“疥疤财主”躲端午

刘甲凡

在我们家乡，有端午节驱“五毒”的习俗。按照传统的说法，“五毒”指的是蜈蚣、毒蛇、蟾蜍、蝎子和壁虎。蟾蜍通常被叫做癞蛤蟆，我们乡下人则称其为“疥疤财主”。关于“疥疤财主”的典故有好多，如“疥疤财主躲端午”，就是个挺有意思的小段子。记得那年村里演年剧《血泪铲》，剧中的地主对欠租的佃户暴跳如雷：“你就是‘疥疤财主躲端午——躲得过初五躲不过十五！’”时下的年轻人大多不知这句话是何意，若想知道其由来，就听我唠一下六爷爷制作“蛤蟆墨”这件事吧。

六爷爷是我爷爷的堂弟。他年轻时闯关东，风风雨雨，吃了不少苦。为了生计，他干过好多行当，其中还干过一阵子走村串乡的“医生”，后来居然在张学良的东北军里当军医。西安事变后，六爷爷就瞅空跑回老家了。

回到家乡后，他虽然没挂牌开药房，但村里人有个小病小灾的都愿意找他寻个方子。他也从不让大伙儿失望，是村里人公认的“刘先生”。他有几个“驱灾祛病”的偏方至今我还记得，其中印象最深的当属他制作的“蛤蟆墨”了。

六爷爷的小儿子比我大一岁，我称他君子小叔。我上学那年的端午节，君子小叔带我们几个孩子去看六爷爷制作“蛤蟆墨”。我们兴高采烈地跑去他家，可当六爷爷动手制作时，却把我们一个个惊得目瞪口呆。

六爷爷家院子里有一口小陶土缸，揭开缸口的盖子，看见里面蹲着几只癞蛤蟆。那是在山上放养炸蚕的李爷爷送给他的。李爷爷的炸蚕放养在村西的蛟山上，那里有好大一片梓椴林子。听李爷爷说，炸蚕的天敌有好多，比如大蚂蚁、野蟑螂、拖脚蜂及各种鸟类等。对炸蚕危害最大的当属癞蛤蟆。它有一种特殊本事，一动不动蹲在树下，只要张开嘴，对着树上的炸蚕一吐舌头，炸蚕就会自动落入它的口中。因为它的舌头能喷出一种毒液，瞬间就能让炸蚕失去知觉，所以李爷爷只要发现癞蛤蟆，不仅用石头把它砸个稀巴烂，还用细绳绑住它的腿挂在树枝上，以此吓唬癞蛤蟆的同类。后来，六爷爷和他打招呼，说要用癞蛤蟆制作“蛤蟆墨”，李爷爷就多次给他送上门来。

天快晌午了，火辣辣的太阳照在头顶上，六爷爷开始制作“蛤蟆墨”了。只见六爷爷从缸里拿出一只癞蛤蟆，两个手指横着一用力，癞蛤蟆的嘴就张开了。紧接着，六爷爷就把一方墨锭从癞蛤蟆嘴里塞进去，再用手挤压着把墨锭一直推到肚子里头。这时，站在旁边观看的六奶奶，麻溜地把穿着钢针的细麻

绳递过去，六爷爷三下五除二就把癞蛤蟆嘴缝合，再把麻绳打个结，随手挂在屋檐下面的木楔子上，说是要在五黄六月火辣辣的太阳下暴晒，等晒成干“蛤蟆墨”就算做好了。那一天，六爷爷一共做了三个“蛤蟆墨”。

其实，六爷爷制作“蛤蟆墨”是用来治病的。我们小时候，几乎每个孩子都患过“肿脖子（腮腺炎）”，脖子上会肿起鸡蛋那么大的红肿块，很难受。每当得了这种病，我们都是赶快去找六爷爷。他在砚台上把“蛤蟆墨”细细地研磨一会，然后用手指头蘸着墨汁涂抹于患处，消肿止痛确实有奇效。

长大后看书才知道，中医都是在端午节制作“蛤蟆墨”。因为按照传统的说法，五月是“毒月”，五日“毒日”，午时是“毒时”，这个时辰制作出来的“蛤蟆墨”疗效最佳。

除了用“蛤蟆墨”治疗“肿脖子”，六爷爷还有好多稀奇古怪的治病偏方，说起来都挺有意思：像治疗膝关节突发性疼痛，六爷爷用的是“吃面虎”和念“打虎咒”；治疗“鬼症疙瘩（荨麻疹）”，是在患者身上写“四大神兽符”；治疗“偷针眼（眼睑腺急性化脓性炎症）”，是用大钢针在拇指盖上划×；制作刀伤药，用的是没长毛的小老鼠，拌合生石灰捣成膏泥，悬挂于阴凉通风处，风干后研成粉末装瓶备用……时常有人上门求药。

此外，六爷爷还有好些“破鬼旋风咒”和“解凶梦咒”之类的“咒语”，每每都成了我们这些孩子的“流行歌曲”了。

六爷爷为村里人治病好多年，从来不收一分钱。乡亲们过意不去，都会送他一点礼物，最起码也送他一把黄烟叶或一兜应季蔬菜，每次都要推辞好半天六爷爷才肯收下。

后来，六爷爷受到了批判，说他搞封建迷信。六爷爷做了深刻检讨，表示从此洗手不干了，还把几方“蛤蟆墨”交给了村干部。没想到，过了没几天，那名村干部的孩子恰巧得了“肿脖子”，情急之下，他就偷偷研了“蛤蟆墨”涂在孩子的患处，居然一夜间就好了。

现在想一想，六爷爷那些偏方不能一概而论，有一些应该含有传统中医的医理。当然，至于那些“打虎咒”“四大神兽符”“破鬼旋风咒”“解凶梦咒”等，肯定是故弄玄虚，过去那些走村串乡的游医，多以此炫耀自己的医术高深莫测。

1988年，国家颁布了野生动物保护法，蟾蜍也在保护之列，特别是中华蟾蜍还被列为国家“三有（有益、有重要经济价值、有科学研究价值）”保护动物。这样一来，“癞蛤蟆躲端午”也就成为“昨天的故事”了。